

基于 CiteSpace 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陶丽萍 葛佳慧

(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48)

摘要:[目的/意义]随着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如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 and 路径,关系到乡村公共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展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演变历程、热点内容与发展态势,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过程]以2015~2021年中国知网(CNKI)的596篇相关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文献进行数据挖掘和归纳分析。[结果/结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近些年发文量维持在较高水平且趋于平稳,但是研究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弱,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功用、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三个层面,未来仍需要拓宽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

关键词:新乡贤 乡村治理 知识图谱分析 CiteSpace

分类号:D422.6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3.01.09

在实行“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双轨政治”制度的中国传统社会,乡贤作为乡村贤能之士,是基层乡村社会主要的治理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当下,面对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文化“沙漠化”、政权“悬浮化”等诸多乡村治理挑战,社会各界对新乡贤群体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到新乡贤和乡贤文化,高度重视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2]。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与传统乡贤一样,新乡贤也是有道德、有财富、有文化、有威望的社会贤达,他们大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精英,热心村庄公共事务,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资源优势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方面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少数民族乡贤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与美丽乡村建设互动研究”(项目编号:18YJA850008)、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基金项目“湖北省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1ZD073)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陶丽萍(ORCID:0000-0002-5216-3173),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Email:taolp0220@sina.com;葛佳慧(ORCID:0000-0002-6764-578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Email:15836896082@163.com(通讯作者)。

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的是, 新乡贤更加趋于平民化, 人员构成更为广泛, 而且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更具多样性。鼓励、支持和引导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 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个体价值, 不仅是对乡村治理需求的积极回应, 而且对于强化乡村内生主体基础、创新现代乡村治理体制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15 年以来, 一些学者逐渐开始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研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 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其中不乏综述类的文章。然而, 大多数综述性文章都是主观性较强的定性分析, 鲜有基于文献计量的回顾性总结和展望。运用文献计量法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领域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 能够以图表和数据的形式更加清晰、客观地展示出文献的分布特征、数量关系和演变规律, 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呈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鉴于此, 本文尝试借助 CiteSpace 这一可视化分析软件, 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作者、所属机构和关键词等进行分析, 绘制相关知识图谱, 以期直观、形象地展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主题现状与热点内容, 并整体分析和把握该领域的发展态势,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数据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为文献数据来源, 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为主题在知网进行高级检索, 时间选取为 2015~2021 年, 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 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7 日, 共得到 631 篇期刊文献。在此基础上, 手动剔除文献述评、会议综述、期刊目录、无作者文献等无效数据后, 最终获得 596 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将 596 篇文献的信息导入 CiteSpace 软件, 借助软件的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现分析等功能, 展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演进脉络, 明确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内容与前沿趋势。

2 研究现状

2.1 年度发文趋势

不同时期发文量的多少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某研究领域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速度。一般来说, 发文量越多, 说明该领域在现阶段的研究热度越高。图 1 是 2015~2021 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发文量。总的来说,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研究热度逐渐升温。根据发文量多少, 具体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为缓慢发展期 (2015~2017 年), 这一时期, 研究队伍薄弱, 期刊文献整体发文量较低, 共发表了 49 篇文献, 仅占研究样本总量的 8.22%, 其中, 2015 年仅有 3 篇文献发表; 第二阶段为迅速增长期

(2018~2019年),与研究初期相比,此阶段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发文量明显增加,且每年的数量变化也较大,相关研究成果250篇,占研究样本总量的41.95%;第三阶段为稳定发展期(2020~2021年),该阶段发文量趋于平稳,年发文量保持在150篇左右,共有297篇期刊文献发表,占研究样本总量的49.83%,其中,2021年发文156篇,为历年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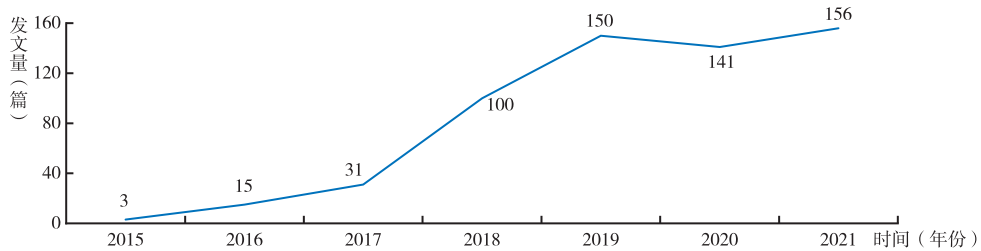


图1 2015~2021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图

2.2 作者发文情况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作者进行共现分析,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2)。在图2中,节点字体大小代表作者中心性的强弱,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节点字体越大、圆圈越大,说明作者的中心性越强、发文量越多。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连线越粗说明合作关系越紧密。图2中部分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从整体上来看,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不高,跨机构、跨领域研究更是稀少,未形成明显的合作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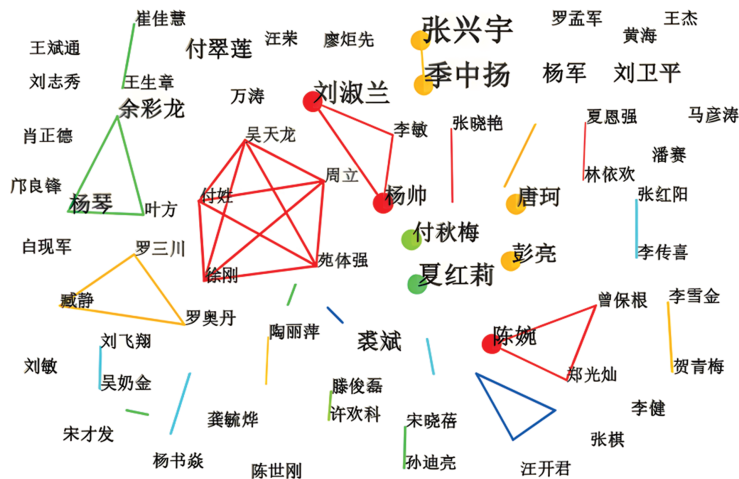


图2 2015~2021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为进一步明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情况,对发文量3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了统计(表1)。从整体上看,这一领域的高产作者并不多,大部分研究者仅发表过1篇或2篇文章,说明聚焦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并不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较为缺乏。此外,发文数最高的张兴宇,共有6篇,但其中的5篇是与排名第二的季中扬的合著,二人来自同一个研究机构——南京农业大学,重合度非常高。其余的发文作者均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相互之间并无关联。可见,这一研究领域并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表 1 2015~2021 年发文量 3 篇及以上的作者

序号	作者	机构名称	发文数量 (篇)
1	张兴宇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6
2	季中扬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5
3	刘淑兰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
4	夏红莉	中共宿州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	4
5	彭亮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3
6	付秋梅	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
7	杨琴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	3
8	刘卫平	湘南学院	3
9	唐珂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	3
10	裘斌	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3
11	付翠莲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3
12	杨帅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13	余彩龙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社科联	3
14	杨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	3
15	陈婉	韶关学院政法学院	3

2.3 机构发文情况

通过对相关研究机构的共现分析得到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如图 3 所示, 可以看出, 节点之间的连线非常少, 绝大部分机构为独立点状分布, 整体合作强度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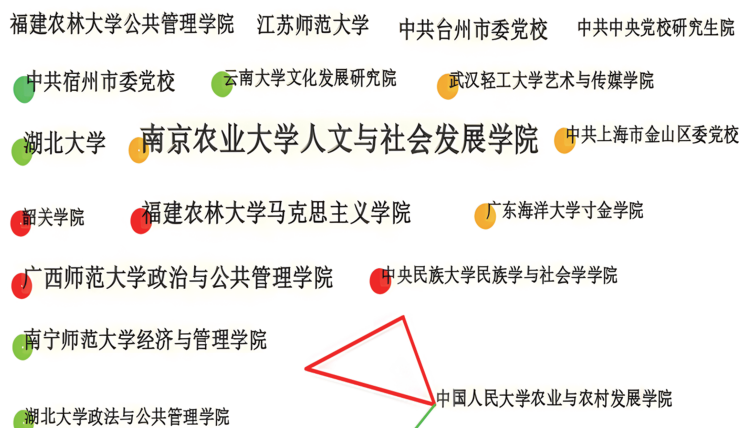


图 3 2015~2021 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依据普赖斯定律可以计算出核心机构的最低发文量, 从而得到某一领域的核心发文机构。普赖斯定律公式为 $N \approx 0.749 \times \sqrt{N_{max}}$, 其中, N 是核心机构最低发文数, N_{max} 代表在统计年限内发文量最多的机构的发文数^[3]。根据统计, N_{max} 为 9 篇, 因此 $N \approx 2.2$, 取整数为 3, 即发文量达到 3 篇及以上的机构被称为核心发文机构, 共有 15 家 (表 2)。可以看出, 这 15 家核心机构全是高校, 但这 15 家机构的发文总数只有 65 篇, 只占全部文献数量 596 篇的 10.9%, 这也充分说明, 虽然高校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但并未达到明显的优势。

表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核心发文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数量(篇)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数量(篇)
1	南京农业大学	9	9	福建农林大学	4
2	湖北大学	8	10	中国人民大学	3
3	广西师范大学	5	11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3
4	福建农林大学	5	12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	3
5	江苏师范大学	4	13	广东海洋大学	3
6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4	14	武汉轻工大学	3
7	中共宿州市委党校	4	15	云南大学	3
8	南宁师范大学	4	-	-	-

3 主要研究内容

将 596 篇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中, 设置时间分割 (Time Slicing) 为 2015~2021, 时间切片 (Years Per Slice) 为 1, 节点类型 (Node Types) 为 Keyword, 阈值选择 Top 50 (代表每个时间切片前 50 个出现的高频关键词生成的网络)。运行 CiteSpace, 进而绘制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时区图以及关键词突现图。

3.1 研究热点: 关键词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

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得出如图 4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每一个圆形的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 圆环越大, 说明该关键词受到的关注越多, 也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圆环的颜色由内向外逐渐由冷色调变为暖色调表示从早期到近期的发文时间^[4]。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 连线的粗细代表关键词共现次数的多少, 连线越粗, 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此外, 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也能反映出某一关键词是否为研究热点。中心性表示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媒介能力的强弱, 一般认为, 中心性大于 0.1, 说明该关键词是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也是研究热点^[5]。表 3 统计了研究时限范围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出现频次前 15 位的关键词及其中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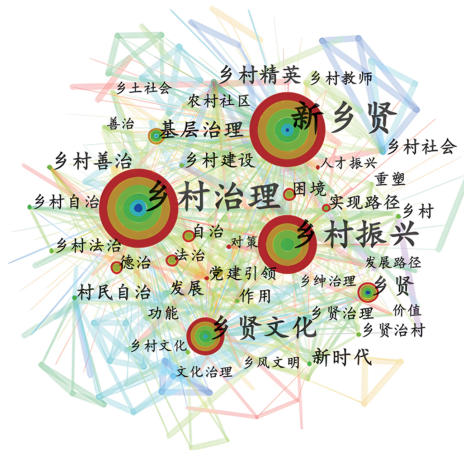


图4 2015~2021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3 2015~2021 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前 15 位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最早出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最早出现年份
1	新乡贤	338	0.89	2015	9	乡村善治	12	0.06	2017
2	乡村治理	293	0.63	2015	10	路径	12	0.00	2019
3	乡村振兴	214	0.37	2017	11	法治	10	0.00	2019
4	乡贤文化	71	0.11	2016	12	自治	10	0.00	2019
5	乡贤	23	0.03	2015	13	乡村精英	10	0.02	2015
6	基层治理	16	0.01	2017	14	实现路径	9	0.00	2018
7	德治	13	0.00	2019	15	作用	9	0.00	2017
8	困境	12	0.01	2019	-	-	-	-	-

根据图 4 和表 3 进行判别分析, 最终判断学界的研究热点主要有四个:“新乡贤”“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乡贤文化”。这四个关键词出现于研究的早期阶段, 频次和中心性都较高, 而且是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要素, 说明本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乡贤”“基层治理”“德治”“困境”“乡村善治”“路径”这几个关键词虽然中心性不高, 但是出现的频次较高, 也是较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为进一步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和热点, 在关键词共现的前提下,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图 5)。Modularity 值 (Q 值) 是图谱网络模块化指标, Q 值越大, 代表网络聚类效果越好。当 Q 值大于 0.3 时, 说明得到的网络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 值是测量聚类同质性的指标, Silhouette 值越大, 说明该聚类内部的相似性越高。一般来说, Silhouette 值大于 0.5 时, 表明聚类是合理的; Silhouette 值大于 0.7 时, 则说明得到的聚类网络是优质的 [6]。根据计算结果, 图 5 的 Q 值为 0.4382, Silhouette 值为 0.7429, 说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效果是显著且优质的。从关键词聚类图谱来看, 形成了“乡村治理”“德治”“新乡贤”“乡贤文化”“乡村善治”“乡村精英”“乡村”“困境”“乡村社会”“党建引领”共 10 个聚类标签, 聚类主要内容见表 4。



图 5 2015~2021 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基于关键词共现和聚类知识图谱分析, 结合相关文献, 总结出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功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在“提升乡村德治水平”部分提出, 要“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所在和作

用表现,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由表4可以看出,研究价值功用的聚类标识主要包括:文化治理、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乡村振兴、乡村精英、乡风文明、乡村善治等。

表4 2015~2021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聚类标识

聚类编号	节点数	轮廓值	聚类标识
#0 乡村治理	58	0.471	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城镇化、乡村治理
#1 德治	57	0.53	乡村自治、乡村德治、乡村法治、法治、德治
#2 新乡贤	44	0.893	乡村振兴、动力、文化服务、培育对策、功能定位
#3 乡贤文化	30	0.847	发展路径、农村社区、乡贤文化、乡村社会治理
#4 乡村善治	25	0.938	乡村善治、善治、枫桥经验、村民自治、自治
#5 乡村精英	24	0.876	乡村精英、乡村建设、实现路径、治理、基层统战
#6 乡村	22	0.849	乡村文化、文化治理、文化、现代乡贤、乡村
#7 困境	18	0.949	乡村发展、困境、作用、对策
#8 乡村社会	12	0.946	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困境、治理转型、专业身份
#9 党建引领	7	0.972	党建引领、凝聚人心、基层党组织、发展之路

在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方面,张兴宇、季中扬基于“消极村务”背景,认为新乡贤在组织村治活动、制定乡规民约以及文化宣讲等方面均发挥着道德涵育作用^[7]。此外,这两位学者通过挖掘乡土社会“礼俗互动”的文化逻辑,分析了农村网格化管理和新乡贤“德治”的协同逻辑^[8]。夏红莉认为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需要新乡贤的积极参与,并且从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层面阐述了新乡贤的角色功能^[9]。在乡村文化方面,裘斌探讨了乡贤治村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提出在乡贤治村的环境下,村民自治将形成经济与道德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10]。李金哲肯定了新乡贤的文化功能,认为新乡贤兼具传统和现代双重文化属性,一方面,新乡贤能够利用传统文化参与乡村治理,引领文明乡风;另一方面,新乡贤自身形成的独特乡贤文化也推动着乡村文化的现代化^[11]。在乡村振兴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新乡贤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贤能人士,是乡村精英的典型代表。部分学者基于乡村振兴角度,指出新乡贤是推动乡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钱再见等通过对江苏省G区的调研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的人才流入机制,提出解决新乡贤人才流入难题的对策^[12]。吴晨晟等则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指出新乡贤能够在规范维度、网络维度、信任维度三个层面为乡村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13]。

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作为畅通智力、技术和管理下乡的重要桥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顺应了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从全国各地的实践来看,新乡贤参与治理的途径、载体、保障和效能还有待完善与加强,仍有诸多因素阻碍着新乡贤返乡,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根据表4,研究现实困境的聚类标识包括:困境、文化服务、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动力等。

杨军是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较早进行分析的学者,他指出:新乡贤组织制度的缺失、乡村治理轻实事求是以及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应急能力的欠缺导致了新乡贤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14]。吴蓉等指出,新乡贤提供的文化服务还存在供给渠道单一、服务平台薄弱、扶持政策缺失等问题^[15]。李敏等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发展面临着新乡贤流失严重、乡贤文化

氛围淡化、新乡贤带头作用不明显以及乡贤组织薄弱等挑战^[16]。部分学者从村民自治的角度阐述了新乡贤治村难题。陈寒非等基于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 指出乡贤组织和村两委容易出现对立状态, 新乡贤可能会“越位”决策, 从而破坏村民自治^[17]。孙丽珍也提出在治理实践中,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能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不利影响^[18]。此外, 部分学者从新乡贤自身因素出发, 指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不足。付翠莲等从政策动员的角度分析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 其中之一就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动力不足^[19]。赵亚楠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困境分为内外两部分, 其中内部困境是指新乡贤返乡动力不足以及新乡贤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欠缺^[20]。

三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基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应的路径研究。由表 4 可知, 与之相关的聚类标识有: 实现路径、治理路径、乡贤文化、党建引领、基层党组织等。

张兴宇、季中扬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视角, 从合作共治、资本积聚和关系联结层面探讨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实践方式^[21]。付翠莲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入手, 认为当前要重塑新乡贤治理模式, 最重要的是大力弘扬乡贤文化, 凝聚乡贤力量^[22]。针对如何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的问题, 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夏红莉提出可以从建设乡贤文化广场、建立乡贤理事会、建立新乡贤激励机制等方面来弘扬乡贤文化^[23]。白现军指出推动乡贤文化传承创新, 应充分挖掘、整理乡贤文化资源, 赋予乡贤文化时代内涵, 同时要加大宣传, 完善新乡贤的政治参与机制^[24]。彭亮认为新乡贤文化是涵育生成更多新乡贤的必要途径, 提出要注重农民工群体、大学生村官和乡村外来人口的文化建设, 拓宽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视野^[2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夯实乡村治理的根基, 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26]。部分学者从党建引领的角度研究了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杨军以协同治理为研究视角, 认为应发挥新乡贤在推进农村基层党建中的作用, 建设具备战斗力的基层党员队伍^[27]。裘斌通过对枫桥镇枫源村的分析得出, 治村型乡贤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必须将党建引领和治村型乡贤的主导有机结合起来^[28]。夏婷等则以绍兴经验为例, 探讨了“党建+新乡贤”的乡村治理模式, 总结出“党建+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启示^[29]。

3.2 研究趋势: 关键词时区图和突现词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基础上, 为进一步了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趋势, 运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 (图 6) 和突现词分析图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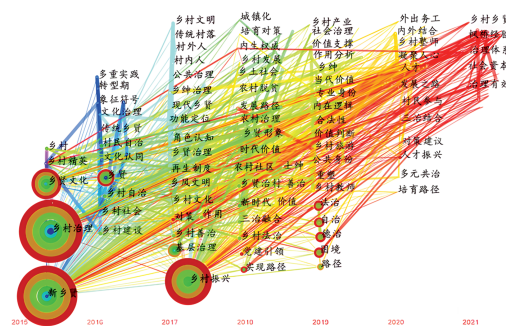


图 6 2015~2021 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关键词时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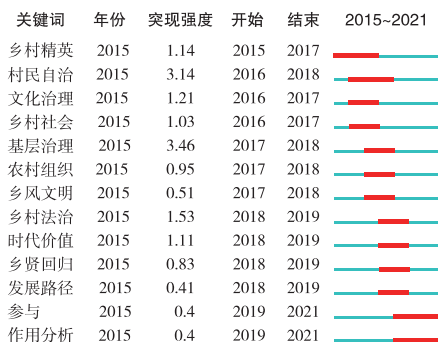


图7 2015~2021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突现词分析图

关键词时区图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研究热点与时间的对应关系，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展现研究重点的变化。而突现词则是出现频次在某段时间内突然骤增的关键词，突现强度越高，说明它受到的关注度越高。结合图6和图7，可以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期探索阶段（2015年）。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30]。”这是乡贤首次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此后，“新乡贤”“乡贤文化”“乡村治理”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关注该领域的学者并不多，研究成果也较为稀少。

二是快速发展阶段（2016~2019年）。2015~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建设美丽乡村，将乡贤文化纳入乡村道德文明建设范畴，强调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2]。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并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31]。自此，乡贤治村这种乡村治理模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可见，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根据文献年度分布图、关键词时区图和突现词分析图，这一阶段的发文量骤增，关键词明显增多，主要有“乡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自治”“法治”“德治”“困境”“实现路径”，突现词包括“村民自治”“文化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法治”“时代价值”，主要探讨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

三是稳定发展阶段（2020~2021年）。这一时期，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愈加丰富，研究开始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从图6可以看出，该阶段涌现的关键词相对减少，“培育路径”“人才振兴”“多元共治”“治理有效”等关键词逐渐突显。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知网刊发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相关文献为研究数据，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一是发文数量快速增长, 高位企稳。但是, 发文作者较为离散, 且多是同一团队、同一领域的内部合作。

二是研究主题相对集中, 热点广泛。当前我国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有四大主题: 新乡贤、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乡贤文化, 主要围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功用、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三个层面, 研究“乡村治理、德治、乡贤文化、乡村善治、乡村精英、乡村、困境、党建引领”等热点话题。前期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为研究重点, 后期更加注重乡贤回归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

三是发展态势阶段明显, 政策导向。通过关键词时区图和突现词分析, 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并且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都与当时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有关, 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在初期探索阶段,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贤相关内容的表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此后有关“新乡贤”“乡贤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精英”等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快速发展阶段, 2016 年至 2018 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2], 这一时期,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日益深入, “基层治理”“文化治理”“乡村振兴”“村民自治”等成为热词。在稳定发展阶段, 2020 年十四五规划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提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这一阶段研究重点集中于“培育路径”“人才振兴”“多元共治”“治理有效”等方面。

4.2 未来展望

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积极发挥新乡贤的资源优势, 强化乡村内生权威力量, 实现由政府部门单一治理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转换, 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益探索。未来研究仍需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 拓宽研究视角。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从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维度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度阐述。一方面说明相关研究已比较成熟, 取得了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视角还不够宽广, 仍需继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 促进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不断丰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知识体系。

第二, 深化研究内容。总的来说,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价值、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研究的同质化和局限性较为明显。需要学者们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研究兴趣, 不断拓展研究外延, 深化研究内容, 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第三, 丰富研究方法。已有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大多都是定性研究, 个人主观色彩较强。虽然不少学者通过个案研究法, 能够准确把握某一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 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但是受到单个或少数样本的限制, 所得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今后还可以运用深度访谈法、田野调查法、扎根理论研究法以及一些定量方法, 推动研究的深化。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EB/OL]. (2014-10-13) [2023-2-14]. 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2] 黄爱教. 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 [J]. 理论月刊, 2019, 41 (1): 82.

[3] 刘从德, 谭春霞.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献的定量研究——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

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 37(4): 51.

[4] 顾理平, 范海潮. 网络隐私问题十年研究的学术场域——基于CiteSpace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分析(2008-2017)[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5(12): 62.

[5] 郝亚明, 秦玉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热点分析与路径演化——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1(2): 23.

[6] 李先跃.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展及趋势——基于Citespace计量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12): 215-216.

[7] 张兴宇, 季中扬. “消极村务”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村治的逻辑、方式及意义[J]. 浙江社会科学, 2020, 36(2): 74-82, 157.

[8] 张兴宇, 季中扬. 礼俗互动: 农村网格化管理与新乡贤“德治”协同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1): 79-89.

[9] 夏红莉. “新乡贤”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19(3): 64-67.

[10] 裘斌. “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J]. 甘肃社会科学, 2016, 38(2): 163-167.

[11] 李金哲. 困境与路径: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J]. 求实, 2017, 59(6): 87-96.

[12] 钱再见, 汪家焰. “人才下乡”: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 35(2): 92-97.

[13] 吴晨晟, 张志胜. 新乡贤助推乡村人才振兴的动力系统分析——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6(1): 17-22, 34.

[14] 杨军. 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探究[J]. 未来与发展, 2015, 39(3): 98-103.

[15] 吴蓉, 施国庆, 江天河.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治村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J]. 宁夏社会科学, 2019, 38(3): 130-138.

[16] 李敏, 杨帅, 刘淑兰.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发展的机遇、挑战及对策[J]. 怀化学院学报, 2021, 40(4): 18-22.

[17] 陈寒非, 高其才.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与规制引导[J]. 清华法学, 2020, 14(4): 5-17.

[18] 孙丽珍.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39(8): 225-233.

[19] 付翠莲, 张慧. “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J]. 行政论坛, 2021, 28(1): 53-58.

[20] 赵亚楠.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述评[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9, 39(7): 8-14.

[21] 张兴宇, 季中扬.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实践方式——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 31(8): 82-87.

[22] 付翠莲.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J]. 地方治理研究, 2016, 18(1): 67-73.

[23] 夏红莉. 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8, 40(4): 96-99.

[24] 白现军.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 36(12): 91-99.

[25] 彭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的生成机理及培育对策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20, 48(22): 233-235.

[26] 新华社. 大有可为的土地 充满希望的田野——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产生热烈反响[EB/OL]. (2019-3-9)[2023-2-14]. http://www.gov.cn/xinwen/2019-03/09/content_537225.htm?allcontent.

陶丽萍, 葛佳慧. 基于 CiteSpace 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3, 5 (1): 102-113.

[27] 杨军. 新乡贤参与乡村协同治理探究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43 (2): 48-52.

[28] 裘斌. 治村型乡贤主导下“三治融合”的拓展和创新——基于枫桥镇枫源村的探索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41 (4): 162-168.

[29] 夏婷, 袁海平. “党建+新乡贤”引领乡村振兴研究——绍兴的经验及启示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 (24): 253-255.

[3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2-2 (1).

[3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17-10-18) [2023-2-14].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Analysis on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CiteSpace

Tao Liping Ge Jiahui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48,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the system and path for new rural sage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is relate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publ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drawing the knowledge graph, the evolution process, hot top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are displaye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ture in-depth research.

[**Method/process**] Taking 596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s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CNKI) from 2015 to 2021 as data sources,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was used to conduct data mining and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s. [**Result/conclusion**] New rural sages'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obvious policy orientatio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recent years remains at a high level and tends to be stable, bu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s weak.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value funct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broade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deepen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s: New rural sages; Rural governanc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CiteSpace

(本文责编: 王秀玲)